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一词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赋予“改革”、“开放”这两个“旧词”以新意的基础上,1984年2月9日在厦门考察时,明确提出和使用了“改革开放”一词。

“改革”、“开放”都是旧词,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经用过。但将这两个词赋予我们今天所指的特定意思,邓小平发挥了关键作用。

邓小平复出后,在多个场合使用“改革”一词。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8年,他在不同场合17次明确谈到“改革”,内容涉及多个领域。

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指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改革进行了系统阐述和动员,赋予了“改革”以新意。

“开放”一词早已有之,但作为党在新时期的一项对外政策,是邓小平提出来的。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谈到了我国“实行开放政策”。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在讲话中把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政策。

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考察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连在一起,明确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

此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改革开放”的字样。《人民日报》上首次出现“改革开放”一词,是在1984年9月13日刊发的一篇报道《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中。从1984年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谈到改革和开放问题时,多数情况下都是把“改革”和“开放”两词连在一起,作为一个词即“改革开放”来使用。

1987年至1993年期间,“改革开放”一词先后写入党的基本路线、党章和宪法,在党和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成为全党共识和国家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党的文献》

溥仪配眼镜 曾遇到阻挠



1921年,退位后的溥仪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内。担任他英文老师的英国人庄士敦发现,溥仪的眼睛已经近视得很厉害了,以至于看不清面前书桌上的小闹钟。

庄士敦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内廷相关人员和溥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没想到他们对此全都漠不关心。

庄士敦自告奋勇找了一个眼科医生,可是端康太妃(瑾妃)严令手下人不要让医生接近溥仪,理由是:“皇上”的龙目非常珍贵,不是任何人都能随便看的。她说:“假如让这个外国大夫检查,结果是近视眼,那皇上就要戴眼镜。这太不像话了,你看一下,我们满清皇上有哪一个是戴眼镜的?”

后来,庄士敦以辞职相威胁,内务府和醇亲王只得勉强同意。庄士敦瞒着端康太妃请来了协和医学院的知名教授、著名的眼科专家贺华特。贺华特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一直拖着不看医生,听到庄士敦讲述遇到的种种阻挠时,更是感到难以置信。就这样,溥仪戴上了眼镜。据《紫禁城的黄昏》

中国首个元旦很冷清

1913年的癸丑春节,已是这一年的第二个“新年”了。一个多月前,中华民国刚刚庆祝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元旦。在老百姓的口中,它被称为“新新年”,以区别于传统春节的“旧新年”。原本该腊月二十三就封印的官府,在“旧新年”里遵命如常办公。

南北统一,政府北迁,又适逢新年,原本应该大张旗鼓地庆祝,可北京城里并无多少过节的气氛。除了少数店铺门前换了春联,普通人家的日子一如往常。临近腊月了,北京人想的是随后而来的“忙年”,根本没有将官府定下的“新新年”放在眼里。

曹汝霖1913年元旦庆典时正在北京,据他的回忆,之所以这个元旦在北京显得格外冷清,皆源于老百姓对新政的误解:“因内政部令警察总厅,晓谕人民,从今年起改用阳历,家户店铺应换春联,旧历除夕元旦不许放鞭炮等云,人民误会,以为改了政体,不许再放鞭炮,故元旦寂静无声,不若往年之热闹也。”

1913年第一个元旦过后,《大公报》曾就“官厅热闹、民间冷清”的场景发出感慨:“今年之新年,只可谓之官国二年,不可谓之民国二年。以庆贺者只有官场,于人民无与也”。在普通百姓的心中,这仍然是“官家的新年”,凑的也只是官家的热闹。正如民间通称阳历为“官历”,阴历为“民历”,官派与民俗的分野,或许就是新历始终难以取得完胜的关键。据《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

恢复高考时未调用《毛选》五卷纸张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发布是在10月21日,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40个年头。

40年前的许多故事又被人们广为传颂。其中流传很广的一个细节是,由于报考人数过多,当时中国百废待兴,居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印考卷,最后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解决77级的考卷问题。

其实在1977年10月份公布恢复高考之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全部印制完毕。因此,“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特别是耽搁印制《毛选》计划,就成为一个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前夕,1977年9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亿册印制任务胜利完成”的消息,说从4月15日以后,“截至八月底,全国已经印制普及本、平装本、精装本共二亿册,繁体字竖排本、大字线装本也将在国庆节前后出版。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少数民族文版,印制了盲文版,外文已经翻译出版发行了日文、英文版,法、俄、西班牙文版将陆续翻译出版。”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1977年9月份之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全部印制完毕,而且是“胜利完成”两亿册的印制任务,所以12月份高考举行的时候,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耽搁《毛选》的印制任务。在1977年“两个凡是”还大行其道、个人崇拜仍然盛行

的时候,高考还没有重要到能够耽搁《毛选》印制任务的程度。

当时只是有少数省份打电话到教育部,问能否动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剩余的纸张来印制高考试卷。当时教育部经过请示,同意可以用印《毛选》五卷剩余的纸张。最后高考报名人数不是最初预计的2000万,而是570万,减少了许多。因此是否有哪个省后来真正动用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剩余的纸张来印制高考试卷,仍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

1977年恢复高考时“调用印刷《毛选》五卷纸张印制高考试卷”的说法,应加上“剩余”二字,虽然其决策的重要性和传奇色彩大大减低,但却符合历史事实。据《中国科学报》

淮海战役中孙元良放弃兵团逃走

孙元良(1904-2007),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四川成都华阳;父亲孙廷荣,曾任清廷知县;叔父孙震,川军将领。孙元良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曾任国民革命军88师师长、第22集团军司令官、国民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等职;1949年后去台湾,2007年以103岁高龄在台北去世。

孙元良兵团于1948年9月成立,辖47军、41军和99军,装备较为精良。淮海战役打响后的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当日晚至12月1日19时,杜聿明率孙元良、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及徐

州党政机关并裹胁部分青年学生共30万人,全部撤离徐州。中共中央军委要华野密切监视其动向并进行堵截。12月1日,华野渤海纵队占领徐州,到4日拂晓,将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围困在徐州西南65公里的陈官庄地区。

12月6日,杜聿明在李弥兵团司令部召集会议,决定放弃南突围解救黄维的作战计划,邱、李、孙三个兵团分别从西面、东北和西北突破。孙元良回到兵团部后,立即部署突围。将重型武器和装甲运输车辆及笨重行李全部破坏,炮兵牵引骡马改为骑兵乘

马。各军以营为单位,分散突围,钻隙迂回,避免硬打;如遇共军阻击,必须且战且走,避免迟滞。

会后不久,李、邱经实地察看,认为突围无望。杜聿明叫孙再去研究作战计划。孙元良根本不愿去,然后还特别命令通信营把所有电话线截断,电台也停止发报,即使是杜聿明指挥部发来的电报,也一概不收。

就这样,16兵团3万多人马陷入解散状态,四散逃窜。由于大家逃窜心切,并未按规定的时间、路线、方向行动,以致一开始就慌不择路,混乱不堪。孙元良

由374团官兵簇拥着逃跑。在经过邱清泉兵团第12军防区时,遭到猛烈射击,不少士兵当场被打死打伤。孙元良化装成中尉副官,混在乱军之中,和师长陈仕俊等一些人逃至河南夏邑西南附近,离陈官庄包围圈中心有六七十里,才敢暂时喘息。孙元良躲藏在农民床下,躲过了解放军的搜查。后又化装成农民,辗转12天,于18日逃到了河南信阳。

回到南京后,孙元良对蒋介石大谈“机智脱险”,并“再次请缨杀敌”。蒋介石正在用人之际,没有给孙元良处分,而是让孙仍任新建的16兵团司令。不久,16兵团在四川起义,孙元良只身一人逃往台湾。据《人民政协报》

康有为曾提倡“安乐死”



“安乐死”的主张,给医学、法学、伦理学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大约一个世纪前,康有为就已经提出用科学手段实行“安乐死”的设想了。

在《大同书》的最后部分《癸部·去苦界至极乐》中,康有为明确地提出:“若其(指垂危病人)气尽,呻吟太苦,众医脉之,上医脉之,知其无救,则以电气尽之,俾其免临死呻吟之奇苦焉。”

康有为早自1884年就开始撰写那部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巨著——《大同书》,其中描述了

他对未来世界的美好理想。由于他自知这些理想超出了当时人们能够接受的水平,所以,除了最亲密的学生外,他一直把这部著作秘密保存,不肯示人,并不断修改补充,临终尚未最后定稿,直到去世后,才由其弟子整理,将此书付印。因此,这部书里的具体段落,究竟是什么时间写的,很难做出结论。但总是在本世纪初,甚至在上世纪末,则是无疑的。

中国古代人追求的是延长肉体生命,所以在中国产生了举世无双的“肉身成仙”的道教,而从未有过确属不治时终结生命的想法。而康有为大概是在接触到近代知识后才产生这种新颖想法的。

据《团结报》

北方为啥管街道叫胡同

从史籍中看,光是对“胡同”这个词的写法从元朝到清朝就有:街通、火弄、火幢、火巷、火街、胡同、街衢、衢衢等。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教授在《胡同及其他》一书中,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胡同”这个词进行了分析,指出胡同这个双音词的种种写法,是借字表音。

关于胡同这个词的来历,旧日有三种解释:一为“方言”;二为“弄”或“巷”的缓言,是“巷”的反切;三为《说文》衢字的衍化。然而三种说法均不圆满。张先生假设胡同是个借词。蒙古语、突厥语、维吾尔语、鄂温克语、女真语、满语等“水井”,大致是huto这样的音,被汉语吸收,到了明清大量使用,使胡同原义(有水井处)转为街巷,并被看作是汉语本

身的词了。

已故北京史研究会会员曹尔骥先生在《北京胡同丛谈》一文中曾谈道,“胡同”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元曲,如关汉卿的《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的词句。还有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曹先生曾设想胡同是“浩特”的音转,因“浩特”最早是居民聚落之意,后来发展为城镇。

有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人多田贞一,1944年写了本《北京地名志》。他说:胡同正写是衢衢,相当于小通路、横街、小巷等。它是从蒙古语来的。在内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据内蒙古来的人说,锡林郭勒地方的包,五六个集在一起,就称为胡同。

关于胡同,还有一种解释为“火幢”,金末元初,蒙古人开始兴建元大都,当时城内居民的住房都是按片分开,中间辟有通道,这种通道在蒙古语中的读音为“火幢”。后来北京人便逐渐读成了“胡同”。

既然胡同是可以等同于街巷的城市建筑布局的专用名词,为何不干脆称其为街呢?原来元朝所建的大都当时对大街、小街和胡同是有具体宽度标准的。当时规定大街宽24步(约合37.2米),小街宽12步(约合18.6米),胡同宽6步(约合9.3米)。但这一规定,随着朝代的更替,到明朝和清朝也就不那么严格了。明朝废弃了元朝的一些大面积建筑群后,原址上出现了一些不规则的小胡同。清朝又废弃了明朝的一些衙署、府第、仓场,这些地方也自然形成了一些不规则的胡同。

据《北京的胡同》